

曾海军◎主编

肇端发始见人文

第一届

『儒家人文与素质教育』

研讨会论文集



四川大学出版社

儒家入文学最初起源于“儒家与人文”这一论域，主要是希望围绕着儒家与人文观念或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展开思考。后来将这一论域更为清楚地定位为儒家与现代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人文精神的实现总是离不开具体的诸人文学科的教育，而儒家却奇怪地在诸人文学科中全面缺失，这是十分让人深思的。从儒家与人文学现状之间的关系看，儒家入文学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其一，以儒家为衡准的现代入文学之批判；其二，儒化现代入文学；其三，重建儒家入文学。

◆ 四川大学“公共基础课课堂质量提升计划”项目

曾海军◎主编

肇端发始见人文

第一届

『儒家人文与素质教育』

研讨会论文集

责任编辑:余 芳
责任校对:陈 蓉
封面设计:阿 林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肇端发始见人文:第一届“儒家人文与素质教育”
研讨会论文集 / 曾海军主编.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 2015. 9

ISBN 978-7-5614-8983-3

I. ①肇… II. ①曾… III. ①儒家—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B222. 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0961 号

书名 肇端发始见人文

——第一届“儒家人文与素质教育”研讨会论文集

Zhaoduan Fashi Jian Renwen: Diyijie “Rujia Renwen Yu Suzhi Jiaoyu” Yantaohui Lunwenji

主 编	曾海军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8983-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70 mm×230 mm
印 张	16.75
字 数	27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cn>

本书作者

- 曾海军 四川大学哲学系
高小强 四川大学哲学系
李秋莎 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
娄林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文明研究中心
廖恒 西南交通大学中文系
梁中和 四川大学哲学系
张发志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邓晓可 成都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壁生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刘伟 中山大学哲学系
吴小锋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周春健 中山大学哲学系
杨海文 《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
吴宁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李晓宇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陈畅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丁纪 四川大学哲学系

儒家与人文（代序）

——一种儒家人文学的界定

曾海军

儒家人文学是由我们儒家哲学方向的三位老师，通过共同交流和讨论提出来的。三位老师最初提出儒家与人文这一论域，主要是希望围绕着儒家与人文观念或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展开思考。后来通过相互间的讨论，将这一论域更为清楚地定位为儒家与现代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这是由于，人文精神的实现，总是离不开具体的诸人文学科的教育，而儒家却奇怪地在诸人文学科中全面缺失，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我们通过讨论一致认为，从儒家与人文学现状之间的关系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其一，以儒家为衡准的现代人文学之批判；其二，儒化现代人文学；其三，重建儒家人文学。儒家人文学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提出来的，而真正要全面重建儒家人文学，可能需要学人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共同努力，这是一个庞大的时代课题，显然不是本文所能论述清楚的。本文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紧密结合高校中的人文素质教育实践，将全面重建儒家人文学收缩为重新建立一门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但即便只是建立一门新的人文教育课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一个不断尝试、摸索和调整的过程。本文仅仅尝试着提出儒家人文学的基本观念和大体构架，为儒家人文学今后的构建工作提供一些思考的可能性。

一、人文、人文学与人文精神

汉语语汇中的“人文”，原本出自儒家的经典文本，但自从将Humanism翻译为“人文主义”之后，它就告别了儒家的原义，进入西学语境当中流连忘返了。现在也许是时候该让“人文”这一观念归家了。当然，回归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得努力完成许多工作，比如先要梳理一下进入西学语境之后的“人文”都有过什么样的思想历程。

几乎就在“人文”进入西学语境的同时，有学者就已经开始用“人文主义”来反观儒家或中国文明了。西方人文学或人文主义自有其清晰的渊源，从古希腊开始到中世纪都有人文学的影子，而至文艺复兴时期殊为强盛，以至于还可以用“人文主义”来概括文艺复兴。英国哲学家席勒在其著作《人本主义研究》中将人文主义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文艺复兴时期、19世纪德国的浪漫主义时期和20世纪的多元分化时期。而阿伦·布洛克则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直接从文艺复兴开始分期，包括启蒙运动、19世纪和20世纪几个阶段。可见，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阶段是比较清楚的，其相关学术成果之多，也超出了本文所能梳理的范围。本文主要集中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中国学人的过程，以勾勒其大致的思想进程。

西方人文主义最开始影响到中国学人，必然绕不开美国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作用。不过，据说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所倡导的新人文主义与儒家价值的接续，并不能入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法眼¹。当然，中国或儒家人文主义这一理念的树立和倡导，确实是由诸多现代新儒家学者们共同完成的。光是聚焦于这一方面的作品，就可以列出许多来，比如牟宗三的《人文主义的基本精神》《人文主义的完成》《人文主义与宗教》，唐君毅的《世界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名义》，徐复观的《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成长》《一个中国人文主义者所了解的当前宗教（基督教）问题》，杜维明的《儒家人文主义与民主》，等等，这还不包括大量并未以“人文主义”命名的相关论述。现代新儒家学者们注重于阐发儒家的“人文精神”，揭示儒家或中国文明的人文精神面貌，由此形成与西学的比较而获得对自身的定位。

如何通过揭示人文精神面貌而定位自身呢？要么是以儒家或中国文明为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与西方文明中的人文主义是非主流或有限制相比照；要么是以儒家人文主义精神自身的鲜明特征，而与西方人文主义相区分。前者以唐君毅为代表，其一生以阐发中国的人文精神为己任，而声称西方人文主义“差不多均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²。牟宗三亦谓：“在西方学术思想传统里，人文主义不是主流。而且它也是潜伏在那里，时

1 参见朱寿桐：《“新人文主义”与“新儒学人文主义”》，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八期。

2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台湾学生书局1980年，第442页。

隐时显，因此它始终没有彰显出来，完成其自身之系统，以为领导其文化生命前进之骨干。”¹徐复观以为“中国文化，为人文精神的文化，现时固已成为定论”，并强调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内容上，却相同的很少”²。直至陈荣捷依然声称中国哲学的特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人文主义”³。对于后者的阐发就更多，其要都在于与西方人文主义中充满着人神之间的对峙、人物之间的分裂、身心之间的二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紧张进行比照。在牟宗三看来，“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虽表示人性的觉醒，个性自我的觉醒，然其所谓人性仍只是对自神本落下来而说”⁴，是批评其宗教性。唐君毅则认为，

……，人神对立而并立。由此，现代新儒家都十分强调儒家的人文主义是以“道德主体”为基础的，既能避免神性的凌驾，亦能克服兽性的堕落。蒙培元在论儒家人文主义的特质时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是一种生命哲学，视自然界为一生命整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人的价值在于实现其天赋德性，人的主体性在于实现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⁶，是比照西方人文主义的人物分裂来说的，同样也延续着“道德主体”的特征。黄俊杰论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时将其概括为身心一如、自他圆融、天人合一和历史意识⁷，也能照应出西方人文主义的各种弊病。杜维明强调儒家是作为精神性的人文主义，余英时声称在历史的基本立场上“偏袒人文主义”⁸，主张一种人文主义历史等，其用心多在以儒家人文主义可以对西方人文主义形成某种纠偏补失。

以上主要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梳理了如何揭示儒家人文主义精神面貌的思想脉络。也有对人文学不一样的研究方式，着眼于人文观念本身的特征来思考儒家或中国文明。黄克剑对“人文学”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认为人文学是

- 1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58页。
- 2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页。
- 3 陈荣捷：《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页。
- 4 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第169页。
- 5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141页。
- 6 蒙培元：《儒学人文主义的特质》，载《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一期。
- 7 黄俊杰：《东亚儒家传统中的人文精神》，载《文史哲》，2011年第三期。
- 8 余英时：《民主制度与近代文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觉悟”之学，人文学的慧眼在于“态度”的觉解，人文学的底蕴在于人生意义的体认，并以原始儒家为思想资源，主张以“由‘仁’而‘圣’所追求的虚灵的真实”作为“终极眷注”¹。最让人受启发之处在于，黄克剑论道，“正像佛、耶之教可以审观人文，人文之学（觉）也未尝不可以返视佛、耶。人文的胸怀当有大得多的容纳……”，具有以人文学反观佛、耶之教意识，殊为难得。他对人文学尝试从人论、文论、士论和学科论进行构架，也极具原创性²。与此同时，在胡伟希看来，“对于人文学而言，对‘人’的理解必须透过‘文’；反过来，研究‘文’的目的，是为了认识‘人’”，因此，“强调对人的价值以及生命的意义的探究”和“以人文学科的具体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只是“人文学研究中的人与文这两个不同方面”，最后他强调中国哲学的诠释学传统或许能为人文学研究提供出路³。可以看出，在把握人文观念的过程中，黄克剑侧重的是“人”的一面，强调觉悟和体认，而胡伟希倾向的是“文”的一面，注重经典和诠释。

不过，西方人文学一直以学科的方式存在，后来发展为学科群，并最终在19世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据说是德国哲学家狄尔泰率先在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意义上使用“人文学科”，如今其早已形成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足鼎立的学科局面。通过这三种不同学科体系之间的对比来开展人文学的研究，要么特别强调人文学之独特性，要么致力于打通人文学与其他学科体系之间的鸿沟，这些方面也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万俊人“主张将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知识系统分别加以讨论。惟其如此，我们对现代知识图式的理解才可能达于清晰和准确”⁴。但有的学者却认为，现代新儒家学者倡导儒家人文主义“加剧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分离和对立”⁵。无论是哪种立场，都是以西方的学科意识来思考问题。当然，似乎也有例外，有人就从自身的学科现状出发，提出了“人文儒学”的构想。李

- 1 黄克剑：《什么是人文学》，载《东南学术》，2007年第二期。
- 2 黄克剑：《人文学论纲》，载《哲学研究》，1997年第九期。
- 3 胡伟希：《人文学与中国哲学传统》，载《新视野》，2010年第一期。
- 4 万俊人：《人文学及其“现代性”命运》，载《东南学术》，2003年第五期。
- 5 孟建伟：《以人文涵盖科学——现代新儒家文化观及其偏颇》，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七期。

承贵着眼于学科的分化，不甘于儒学在学科体制中被边缘化，从而提出“从百科全书式儒学走向人文儒学”，强调“人文儒学是被分化出来的儒学学科体系之核心”，主张被分化出来的诸学科中“都有人文儒学精神的投射”，并“体现儒学的人文精神和价值”¹。不过，这一构想被夏锦乾数落为“西方‘人文’+东方‘儒学’的结果”，这是由于在他看来，“西方的人文主义恰恰是立足于个体，从个体的人出发，在西方人文主义中，类属于群体的‘人’仅仅是对个体人的综合的结果”，而儒学人文主义的难题是，“一个类属的群体的‘人’如何应对随着时代的进步，个体‘人’的日益觉悟进而起来争取自身的权利的问题”。夏锦乾的这一看法有陈旧之嫌，诸多现代新儒家学者正是主张立足于个体的西方人文主义才是要被克服掉的。但他坚持认为儒学有自身完整的统绪，反对李承贵这种随意推演的“运算”方式，这还是能击中要害的。至于他居然将儒学的统绪归结为“巫性化的家族血缘制度的产物，它的每一个概念都必须而且能够从这个制度的统绪来得到说明”，则又让人大跌眼镜了²。

以上分别从人文的精神特征、观念特征与学科特征三个方面，大致梳理了西方人文主义对中国学人的影响。其中，以现代新儒家学者揭示出儒家人文主义精神的特征为主，积累了最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是重新思考儒家人文学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同时，黄克剑教授对“人文”内涵的阐发和构想，对儒家人文学具有直接的启发性；而李承贵教授基于学科意识所提出的“人文儒学”，与儒家人文学亦有相当的呼应。本文将所提出的儒家人文学定位为一门具体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在学术上力图超越比较的视域而完整呈现出儒家自身的人文学内容，同时亦能作为一门新的课程应用到高校人文素质教育中。

二、儒家与人文教育

通过对人文学相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以概括出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如何通过西学来定位或把握自身文明这一问题意识。西学的强势输入犹如那黑暗中射入的万丈光芒，几乎让所有中国学人在这炫目的光芒中乱了阵

1 李承贵：《人文儒学：儒学的本体形态》，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十二期。

2 夏锦乾：《“人文儒学”质疑——兼论如何正确认识儒学》，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七期。

脚，有许多的人为这令人窒息的光辉欢欣鼓舞，亦有人在一阵阵眩晕中力图认清自身。但此时谁也无法在眩晕中再原原本本看清自身了，一切似乎都变得面目全非。要重新辨认自身，已经无法摆脱西学这面镜子，只有通过打量这面镜子里的自我，才能辨认出一些特征来。镜子当然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这里仅仅是借了只能通过镜子看自我之喻。正是基于对西方人文主义的认知，才通过这种思想资源来反观自身，揭示出自身文明作为人文主义的精神面貌。现代新儒家学者是这样，其他不同的研究方式也是这样。不能认为这种问题意识就错了，尤其是在众多学者陶醉于将西学的光芒投射的身影当作自我的氛围中，有这样的問題意识已然难能可贵。虽说建立儒家人文学的问题意识与此不同，但离不开基于这种问题意识的成果积累。如果从一开始就没有学人坚守对自身文明的把握，则儒家人文学的问题意识可能永远也不会有机会呈现。

与现代新儒家的处境不同，西学的万丈光芒在今天已经散去，至少我们不必再做眩晕状，这算是有利的方面。也有更为不利的一面，即西学已经化为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器物设施，甚至制度建构。这就好比神话小说里描述的情境，突然闪出一道白光，刺得人睁不开双眼，等我们揉着双眼回过神来，再定睛看去，白光没了，身边却多出许多未曾见过的物什来。无论是满心欢喜还是满腹生疑，事情已经是这样了，只要不再眩晕得找不着北。既然已经回过神来，那就得好好搞清楚状况。之前我们总是得比照人家来找自身的独特性，或者就是在人家的东西里来照见自身，如今发现我们已经身在人家的器物设施之中。在这样一种处境中，要么径直将当下认作自己，要么就得试着直接来感受自身的存在，而比照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甚至还不无荒诞感。比如面对现代诸人文学的现状，一切遵从西学的人文建制，却还要大谈儒家人文主义的自身特性，这不是在搞黑色幽默么？我们只有就着这种处境来做工作，就着现代人文学科来思考原本该是的样子。

具体而言，儒家人文学的问题意识基于目前高校人文教育三个方面的现状。

首先是学科设置的现状。在现代大学文、理、工、医的学科体制中，传统的儒家学问几无容身之地。一方面是传统经学的分化瓦解，相关的经学典籍分别置于文、史、哲不同学科中，统统以西方的学科方式进行肢解研究，而失去了经学的根本大义。这个问题已经被诸多中国学人意识到，国学院的建立或者

古典学的提出，都与这种问题意识分不开。另一方面，真正富有儒家精神的学者，基本上只能蜷缩在哲学学科下作为八个二级学科之一的中国哲学当中，在整个学科体制里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甚或万分之一的生存空间。宏大的传统经学如果不甘于这种憋屈的生存处境，就得另想办法获得更好的出路。

目前，各种国学院或研究机构的纷纷成立，同样也可以视为是基于谋求传统学问在现有学科体制中有更好的生存空间。不过，由于学科内部之间存在难以消除的鸿沟，仅仅只是机构上的设置未必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就像有的国学院做出来之后，也仅仅是将文、史、哲这些不同学科的人放在一起，最终还是不同学科的人按不同学科的方式来培养学生。这可能跟“国学”的提法并非基于学科本身有关，相比之下，“古典学”对于学科的分化具有更强的针对性。但“古典学”本身亦有先天不足，即受制于西方古典学，无法摆脱中西比照的视域。如何思考学科自身的突破，“国学”和“古典学”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应当说，前文所述“人文儒学”的提出，是具有这方面的问题意识的，惜其依然停留在西方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中，决定了其不可能在“人文儒学”上有真正的建树。儒家人文学基于这一问题意识，致力于儒家精神资源的人文学建构，才有可能真正取得突破。

其次是现代诸人文学科的现状。现代人文学科大概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宗教、教育诸学科，这些学科如理、工一样完全按西方的学科体制来建立，但不同的是，人文学科的内容是分中、西的，中国大学的人文学科课程所编写的内容，主要还是得从传统学问当中来。这就导致了一种十分怪异的现象，即学科课程从研究方法到精神理念都由西学提供，但处理的内容却是中国的传统学问。这甚至造成大量的学者在课堂上讲的是传统学问中的内容，却反对传统学问中的精神。带着一种厌恶之情做着传统学问的研究，这是现代诸人文学科中最畸形之处。要让一个学者带着一种温情来研究传统学问显得那么艰难，虽说并非没有热爱者，却多是出于偶然。依据儒家人质相称的主张，人文学科既然是关于“文”的学科，则一定有一个相应的“质”在那里。有了“质”才需要有“文”，也才可能有关于“文”的学科。“文”是将“质”恰当地表达出来，如果不是先有“质”，“文”就变得很奇怪了。西方学科体制中的人文学未必没有其“质”，但中国现代大学照搬人文学科，能把样子学好了不得了，“质”就不要指望了。效果不一定如东施效颦一样糟糕，但要想

拥有西施那般气质，却指定是南辕北辙。中国高校的人文学科中，或有其文无其质，或文质相离，或文质错位，种种怪象充斥在各学科中，总之是全面缺失一种文质相称的精神资源。

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西方的商业大片中极尽各种拍摄技术之能，但始终会有某些主题或精神，当然也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在影片里时隐时现。中国导演跟着拍大片时，也很快学会了制作场面恢宏、视觉冲击、声响震撼之类的效果，但找不着一种精神性的主题来呈现。这个要是也去学人家，就一定是东施效颦的烂片。中国的导演要是想刻画自身文化丑陋不堪的一面，倒也往往能做到入木三分；可一旦想宣扬正面的价值，可能刻画几个小人物还勉强，但要是想表达那种恒长的宏大主题，就完全傻眼了。随着爱国主义或解放事业之类的红色主题淡出之后，中国的艺术早已不具备表达宏大的精神主旨、永恒的精神价值这种能力，而且恐怕是连这种意识都丧失了。这又何尝不是其他人文学科的现状呢？所谓缺失文质相称的精神资源，大致指的就是这种景象。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舍儒家精神又还有别的选择吗？正是由于儒家精神在现代诸人文学科当中的全面缺失，导致了这些学科对宏大主题和永恒价值的集体失语。儒家人文学致力于成为诸人文学科的基础课程，旨在为所有这些学科提供统一的精神滋养，从而还诸人文学科以文质相称的面貌。

其三是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目前，各高校纷纷开设各类人文素质教育公选课，除了一些国学院、博雅学院、儒学研究院、古典研究中心之类的专设机构承担起人文素质教育之外，还有以各种名目设立的人文素质课程。但是，对于什么是人文素质，其实都只是很模糊的印象，而无法达成哪怕是最基本的一些共识，甚至对于这种教育应当被称作人文教育、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还是国学教育、古典教育，都达不成一致意见，更遑论就这一教育的基本经典书目达成共识。各类素质教育课程的开展，从一个最好的教学效果来讲，要么成为寓言故事式的教育意义或者名言警句式的心灵鸡汤，要么只是增加了某些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更等而下之者，竟成为某些“段子手”用以迎合学生趣味的课程。这一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决定了其对真正提高大学生人文教养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当然，也有不少人文教育集中于经典的研究，力图带领学生直接面对一个文明的经典。但究竟应持何种文明，读哪些经典？很多专设机构高调成立，却也蜕变得非常快。这固然跟复杂多变的情势相关，却也

未必不是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定位失当所导致。所谓“观念之不纯正、立意之不高远”，往往是刚开始搞得轰轰烈烈，却持续不了多久而陷入“通识不通识、古典不古典，而人文亦不人文”之境地。这正是由于“其所秉持之观念、理想不足以润泽其所施設，然后种种仓皇之状”¹。儒家人文学从“人文”之最初自天文、地文所翻转处论起，反复锤炼“人文”之理念而确保其精粹，由纯正的理念和高远的立意而下贯到人文素质之教育。只有获得了这种根本的立足之处，才能彻底改变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并使其避免陷入快速蜕变的困境。具体而言，作为一门新的人文素质基础课程，儒家人文学可以使得高校的文化素质课程不再是含糊的、可有可无的以及大学生们竭力敷衍的，而是能让每一个大学生都能真实地体会到，儒家人文学对于为人、为学都具有根本性的滋养作用，并最终使其成为一门完全不可或缺的受到广泛认可的素质基础课程。

三、人文与成人之道

儒家人文学力图不再通过西学这面镜子来打量自身，而是直接感受自身的存在。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与“人文”这一观念直接相关。儒家人文学致力于从儒家文明自身来阐明人文学，这一目标也许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何从框架到观念全面摆脱西方哲学的影响，建设立足于自身文明的中国哲学，正是近年来中国哲学界学人们共同的意识和心愿。这种自觉不无成效，今天的中国哲学基于对自身文明的确认，已经大不同于过去上百年来所塑造的那种面目了。只是这种努力可能并不是太如愿，以中国来解中国的哲学建设似乎很难获得突破性进展，这与“哲学”终究是外来观念密切相关。不是原本自身就有的，再怎么植根于自身的文明，终究脱不出一一种比较的视域。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学人开始重提“经学”，这与“哲学”作为西方的观念把握中国文明终究有不够的地方有关。“经学”原本是中国固有的观念，但对于现代学科有多大的可能接纳经学，实在不敢抱什么指望。经学原本是超学科的观念，即便有机会进入高校体制，要处理与各学科之间的关系而又不至于太委曲求全，恐怕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人文”与“经学”一样，都是儒家文明原本就有的观念，但与后者不

1 丁纪：《第一届儒家人文与素质教育研讨会随札》，参见本书第222页。

一样,“人文”经历了翻译的过程,早已脱开了儒家的原义。这原是不幸之事,有如“上帝”的观念一样,原是土生土长的,现在倒好,自从翻译为God,便完全专属于耶教了。要想“上帝”这一观念回归本土,基本上是无望了。只是“上帝”在自家文明中倒不属于核心观念,相当于是地处边缘,而翻译到耶教中就至高无上了。我们也不必感到脸上贴金,实在有太多观念在翻译过程中是受了委屈的,“人文”观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唐君毅所云,“将中国的人文主义译为Humanism时,在内涵上受了委屈”¹。受了委屈可能还事小,如果借道于西方人文主义这一条歧途,那才事大。我们今天理解“人文”,已经很难摆脱西方文艺复兴的影响。从人文主义那里得来的一个核心观念就是以人为中心,这一观念放到儒家文明当中,就有些不明所以。试问,基于儒家思想的理解,不以人为中心是个什么意思?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为了摆脱神学的笼罩,而特别张扬人的价值,尤其是力图表达出人的完满性这一维度。可儒家思想不是一向如此么?完全就找不着针对性。更何况儒家对“人”的理解与西学相比,简直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事,儒家的“人文”观念要表达的内容差别太大。

据说Humanism也翻译为“人本主义”,尽管人本主义更主要是指某些哲学形态,与作为一种思潮的人文主义并不一样,但“人本”显然比“人文”在与Humanism的对应上显得更为准确。儒家的“人文”是对着“天文”“地文”来说的,而“人本”则可以在西学意义上对着“物本”“神本”来说。在儒家思想中,有“民本”的观念,所谓“民为邦本”,民之为本是在邦国的范围内说的,“民本”的观念是在邦国的范围内否定“君本”的可能性,但不会在同样意义上有“人本”的观念。在天地的意义上,一直都有在天地万物之间以人为贵的观念,但不会表达成以人为本的观念,因为不存在一种对应的“天本”“地本”或“物本”的可能性。西学中的“人本”是为了摆脱“物本”或“神本”,而儒家中的“人文”则是自“天文”“地文”中翻转出来的。前者只是针对“他本”而立“人本”,后者则是关于人在天地之间如何超拔挺立,这个差别不可谓不大。在此意义上,“人文”的观念只能属于儒家,甚至未必不可以声称“非儒家不人文”,而将西方的人文主义定位为人本主义。“人

1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第592页。

文”之不像“哲学”，是后者总摆脱不了移植的身份，脱不开比较的手法，而前者自古以来就有，完全可以不从西方人文主义那里再绕回来说。亦不妨说，绕开西学是儒家人文学内在的要求，借道于西方人文主义只会形成干扰。直接回到自身的思想脉络中来呈现“人文”的内涵，也许在中国哲学所无法完全实现的目标，可以在儒家人文学这里实现。

如此一来，儒家人文学顿时显得前程远大，不禁令人抱以期望。不过，新的难题是，儒家人文学如何与整个儒家文明的其他学问相区分？儒家人文学显然不会是儒家文明的全部，而仅仅是儒家文明在现代大学的学科体现。其究竟应该承担儒家文明中的哪些内容，从而与其他学问相区分并且不重叠，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不管儒家文明复兴的热潮当中有多少是值得期待的，不难预料的发展趋势是，儒家文明在未来很可能以多形态、多层次、多面向的格局出现；一定是不同的学人以不同的理解方式在做着儒家的学问，在很长时期里都不大可能出现一家独大的统一局面。有的学人主张以宗教形式来复兴儒教，有的则寻求与现实权力的结合，可能更多的人致力于在民间社会中组织读经或者恢复礼俗。这些人多数都栖身于高校体制之中，对于儒家究竟如何在学科体制内以恰当的方式开展教育，反倒缺乏相应的主张。前文所述种种人文教育形式，只是描述了一种现状，而并未体现出明确的思想主张。儒家人文学代表了以学科的方式在高校里推行儒家教育，寻求与现代学科的结合，以达到对大学生实施全面的人文教育。这是首次以思想主张的方式明确表达出儒家应如何体现在高校的学科教育当中。儒家文明的多种形态应该是处于不同层次，同时具有不同的面向，并决定了各自承担儒家文明中的不同内容。比如，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是崇拜孔子或礼教的信仰，渗透到现实权力之中是参与典章制度的政治，流传于百姓人伦日用之间是以孝道为核心的文化，等等，而以学科方式开展的则是成人之道的教育。儒家的不同形态承担不同方面的思想内容，却并非分割成彼此各异的思想版块，但这仍然面临着相互之间如何区分的难题。

不同的学人对如何复兴儒家文明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诉求，也由此导致对各自工作的不同提法。有提以儒家建教的，也有提以儒家建国的，还有自觉地走乡村建设的路线，可视为是以儒家建乡。儒家人文学的提出，脱不开这一大的复兴背景，不妨将其定位为以儒家建学。以儒家建教是要设教明道，以儒家建国是要教化百姓，以儒家建乡是要敦风化俗，以儒家建学则是教以成人。

由是，儒家人文学以成人之道为主要内容，围绕这一主要内容来予以阐明，是儒家人文学得以成立的关键性工作。儒家的成人之道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表达，最常见的莫过于为己修身。对于儒家学问而言，为己修身是个老话题，也可以说是历久弥新。儒家是一门为己之学，或曰修身之学，皆无不可，此即成人之历程。但儒家讲明为己修身，教虽一套，学则多方。为己修身，若说一套易简工夫，便是明善复初，便是成圣成贤。儒家人文学定位于高校内针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而且不包括培养儒家学者的专业教育。这一人文教育还是成人之道，亦不离为己修身，却不会只是一套易简工夫。儒家的成人从道理上讲是成圣成贤，但不是要求所有人都照着圣贤来悟。成人是成其为人，是让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从人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成就、接受和承担。先以人“文”之而后“化”之，虽未必能“化”之，却必定以人“文”之，此即依人文之义而得成人之道。持守以人的方式应对一切，此即成其为人的过程。此成人之道不离为己修身，为已是不假于人，修身是不待于外。不假于人、不待于外，则人文之义毕而成人之道著。

要做到不假于人、不待于外，立志是关键。只有教育大学生在自己的一生中，面对一切都要以人的名义全副担负起来，树立这样一种志向，达到这样一种自觉，人文精神才能充分体现。这听起来像是在发扬人的主观能动性，但两者之间实则有天壤之别。主观能动性基于客观认识性，既可能陷入主体的膨胀，亦可能导致客体的吞噬。儒家人文学从天地之无始无终处论起，世间的一切都来自于人文的肇端发始，人文自天文、地文处翻转出来，人的立志不过是应承了自天地之间的翻转。树立这种志向和自觉，只是尽了人的本分而已，实在用不着念叨人的什么主观能动性。之所以要求立志，是由于人太容易丧失人文之义。动不动就怨天尤人，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是放任自然，严重者变得神神鬼鬼，乃至堕入魔道，此皆丧失人文精神而背离成人之道。只有立下一个一切皆由人来担负的大志向，追求最为饱满的人文性，才可能持守为己自身的成人之道。这种由着“人文”所阐明出的成人之道，便是儒家人文学针对大学生开展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传统儒家有针对士君子进行四书五经系统的专业教育，也有针对普通百姓进行《三字经》《弟子规》的蒙学教育，而儒家人文学是针对高校大学生开展的人文教育，大致介于两者之间。大学生这一群体的大规模涌现，是传统社会所未曾面对

过的，亦是现代社会对儒家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大学生有自身的专业要求，不可能以四书五经为专业，达不到先知先觉的要求，但亦不能停留于日用不知的阶段，需要在做人上达到一种自觉。由人文而起义所阐明的成人之道，既非明善复初、直指人心的士君子教育，亦非人之初、性本善的蒙学教育，而是针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

四、几个重要的问题

儒家人文学有几个最重要的问题需要先思考清楚，比如人文是如何在天地之间呈现出来的？呈现出来的人文与天地自然之间是什么关系？孔子所言“文质彬彬”在这样一种人文关怀中具有什么样的内涵？每个人如何在这种人文精神中安顿自身的生命？本文先就天地与人文、自然教与人文教、文与质、立志与成人这四个重要问题做一些阐发。

第一，天地与人文。

人生存于天地之间，极易生发出“人生几何”的慨叹。若是感其短促，则庄生之“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郤，忽然而已”¹，堪称经典；若是想表达得豪迈一些，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赤壁怀古》），可作代表。可只是豪迈也顶不住，所谓“沧海桑田五百载，石火电光一刹那”（钱泳），最终可能就是堕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²。谁说不是呢，“是非成败转头空”，人究竟能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什么？“白云千载空悠悠”（崔颢《登黄鹤楼》），真是什么都留不下，除了诗人留下的这种感慨本身。当然，最经典的还是那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可以说，“此等情思，于古今中外文学间实不乏见，读之亦无分彼我，一概可觉打动情衷、互通心曲，可见乃一种人类生存之普遍迷思”³。人立于天地之间，极易感染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的情怀，无论怆然泪下还是心如止水，皆可谓人类生存的普遍迷思。按说，诗人于各种生存境况中作此感慨，亦代表着人于天地之间所可能达到的一种理解和体会。这不正是所谓人文情怀么？人文情怀

1 《庄子·知北游》。

2 《金刚经》。

3 丁纪：《肇端发始见人文》，载《天府新论》，2014年第四期。